

中国未来十年 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2011—2020)

ZHONGGUO WEILAI SHINIAN
JINGJI FAZHAN DE ZHANLUE SIKAO
(2011-2020)

李茂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未来十年 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2011-2020)

ZHONGGUO WEILAI SHINIAN
JINGJI FAZHAN DE ZHANLUE SIKAO
(2011-2020)

李茂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2011—2020) / 李茂生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161 - 1278 - 6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发展战略 - 研究 - 2011—2020 IV. ①F120.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156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3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几年前，在出版《潇湘斋诗词选》时，我曾经在“自序”中提及自己“已经下决心六十五岁以后不再写经济学方面的论著，而转攻文史方面的课题”。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并没有说到做到。几十年形成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改就能完全改过来的，形势有时迫使你无法置身事外，难以真的与经济学说再见。如果说，去年写“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经济工作成就——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还带点“史”的性质；那么，这本《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就直接站到了经济学的前沿阵地。

迫使我“重操旧业”的因素有二：一是国内，自制定“十二五”规划以来，经济下台阶的主张（经济增长速度安排下滑 30% 以上）成为政界、学界之主流，另有某些被西方洗了脑的知识分子精英甚至预言我国经济会崩溃，这使我忧心忡忡；二是国外，唱衰中国的言论更是此起彼伏，最典型者，被称作“21 世纪的诺查丹玛斯”的美国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2011 年 1 月他在美国出版了《未来十年》（*The Next Decade*），书中对美国的未来信心十足，却认为中国会走向崩溃，这又给了我极大的刺激。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集中精力研究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写出一本中国版的《未来十年》。我与李光荣博士共同主持一个课题组进行前期研究，到 2011 年 12 月中旬写出初稿，刊载于《华安保险》月刊 2011 年第 12 期，以此向北京特华博士后工作站的部分专家征求意见，接着由我在 2012 年 1 月 7 日举行的《特华金融论坛》上向与会者扼要地阐述了书中的主要观点供讨论。正如所料，不少人对我提出的未来十年经济年均增长 9% 持怀疑态度。李光荣博士比较谨慎，向我表示他要再花一些时间更全面深入地研究未来十年的发展速度问题，同时考虑到未来十年已经快过去一年半了，时间不等人，所以他建议先以我一个人的名义出书，我尊重他的意见。恰在此时，我见到了观察者网站以“弗里德曼：我对中国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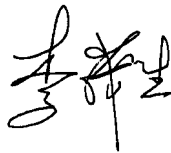
不是崛起，是崩溃”为题转载韩国《朝鲜日报》关于乔治·弗里德曼接受采访的报道（<http://www.guancha.cn/html/>），弗里德曼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断言：“我对中国的评价是崩溃（collapse），而不是崛起（rise）”；“如果失业问题严重，中国就撑不下去。到城市找工作的农民一旦失去工作，就会让社会陷入动荡。为了满足他们，中国向 6000 万人征税进行分配。用征收的税金可以维持军队的忠诚，但中国的这种解决方法只能压迫国民”；在回答“十年以后的中国将会如何”竟然只是反问“为了解决矛盾，是学毛泽东败坏国家？还是重新采取 20 世纪中期的地区主义和不稳定的模式？”言下之意中国未来没有办法，未来十年内将陷入“危机”。弗里德曼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攻击更加坚定了我抓紧出版此书的决心，我不能眼睁睁地任由这类人——美国媒体将乔治·弗里德曼称为“Shadow CIA”（影子中央情报局）——唱衰中国和不断地为某些中国人洗脑。于是我利用春节前后约二十天时间，对初稿进行调整、补充、修正，篇幅扩大了一倍，并新取了一个书名来代替《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这个经院气颇浓的名字。

书稿写成后，我将它搁置了两个多月，主要是一些好心的朋友建议我再看看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再说。“听人劝，吃饱饭”，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再观察观察、静下心来仔细推敲推敲。我冷静过了，也观察过了，形势的变化、经济增速的被压——期间我见到了 2012 年 2 月 22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1 年我国 GDP 比 2010 年增长 9.2%；2012 年 4 月 13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8.1%，连续五个季度增速回落——但这些并不证明下台阶论者是对的，我亦无须修正自己的观点。2011 年以来，宏观管理当局不仅利用财政政策货币和政策双紧缩的经济手段，还利用限购限价限贷限投资等严厉的行政手段，决心将经济增长速度压下去，而经济的实际增速不还是比政府“规划”的速度高吗？在剩下的八年半的时间里，政府难道还有比目前更严厉的打压措施出台吗？不可能！目前的打压政策是政治周期的一种表现，然而政治周期既然是周期就定有结束的时候。新的政治周期即将开始，对待国民经济，从打压转向促进就是一种必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2012 年是 2011—2020 年这十年中速度最慢的年份之一。因此，我的观点未变，结论未变，那就应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了。我依然对未来十年经济保持年均 9% 的增速充满信心。

若问我：为何对中国经济发展如此有信心？我记得王荆公有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我不为、不畏中外唱衰论、悲观论之种种“浮云”“遮望眼”，而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也是“只缘身

在最高层”。不过，我的这个“最高层”不是官本位意义上的，而是我所持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层次，即站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全局的高度，从政治上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中国经济问题；站在我国国家安全、民族振兴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看待未来经济发展问题；以相信中国共产党有处理复杂问题、克服巨大困难、完成艰巨任务的能力，相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创造人间奇迹的能力，从这样的“最高层”综合分析需要和可能作出的经济增速预测，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我还有信心至少活到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后，届时定能看到本书主要观点与结论为实践所证实。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我要感谢李光荣博士、陈昌盛博士、郭宏宇博士、王亚玲博士、李世朗博士、李华罡博士、张菀洺博士对课题研究的参与，特别是李光荣博士，与我共同牵头组织了本课题的前期研究，对本书主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的形成，贡献良多。至于书中存在的问题和谬误，责任自然完全在我，真诚期待对本书的批评意见。



二〇一二年五月一日

于北京望京新城潇湘斋

未来十年（2011—2020），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十年：在政治上，我们党将迎来建党一百周年，届时她在执政党的位置上将交上一份什么样的答卷来欢庆自己的一百周年？在文明冲突日趋激烈、西方文化在我国的影响日盛，而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又相对软弱涣散的情势下，党领导经济发展的绩效如何，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在经济上，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如今已经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方阵，将来是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快速向着发达国家迈进，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一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还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恶化中陷入停滞，沦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于未来的十年。当此之时，令人忧心的是，不仅国外有人在散布中国崩溃论，在唱衰中国，在国内，也有不少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特别是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的影响，对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更是持乐观态度者少而悲观者众。悲观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以“三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来概括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在近期内，他们甚至在讨论我国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的问题，总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要“着陆”了^①；至于中长期，比如未来十年，则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使不掉进去，也只能有6%—7%甚至4%—5%的经济增长。这种悲观论极为有害，必须设法祛除。自从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后，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从来都是乐观的，当我国1996年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我国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时，我们对本世纪第二个十年（2011—2020）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深信不疑。基于本书是从比较高的层次上分析未来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故取名为战略思考。

^① 所谓经济的“软着陆”、“硬着陆”，是一个在经济学界流行多年的错误概念，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包括著名学者和政界名流都在用，实在令人遗憾。我们从1996年起曾多次批判过学界的这一错误（参见《中国财政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可惜伪命题至今依然有人乐道。由于着陆论毫无科学可言，因此，本书此后不再讨论所谓的着陆问题。

目 录

第一章 探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仍须以 GDP 为基本指标	(1)
一 1980—2010 年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GDP 作为基本 指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一) 抓 GDP 总量和人均增长速度就是抓经济发展的 “牛鼻子”	(2)
(二) 民生幸福须以 GDP 增长为基础	(3)
二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要告别 GDP?	(5)
(一) 关于 GDP	(5)
(二) 将一个时期以来体制与政策不当带来的社会问题归 咎于 GDP	(8)
(三) 对 GDP 局限性的指责是试图用一个统计指标包打天下 思想的反映	(9)
(四) 地方政府行为与 GDP 造假	(10)
三 几十年来所有试图创造出取代 GNP 或 GDP 的指标的人 都不成功	(18)
(一) 萨缪尔森的经济净福利	(18)
(二) 关于绿色 GDP	(19)
(三) 对人类发展指数的评论	(22)
四 不是不要 GDP, 而是要改善“带血的 GDP”背后的 生产关系	(24)
(一) 从“带血的 GDP”和谎言 GDP 是“鸡的屁” “狗的屁”说起	(24)
(二) 对 GDP 的约束绝不能仅仅依靠约束性指标	(25)

第二章 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种种预测及我们的看法	(28)
一 对未来十年 (2011—2020) 中国经济增长走势的不同预测	(28)
(一) 国际机构和国外学者的预测	(28)
(二) 国内对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已有的三类预测	(32)
(三) 一个外资机构对预测中国经济中的悲观论的评论	(40)
二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是一个伪命题	(42)
三 我们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及其理由	(49)
(一) 未来十年中国将保持年均 9% 的经济增长速度, 波动区间 (7%—11%)	(49)
(二) 经济增长有惯性, 如无战争或全局性内乱, 速度不可能大幅下滑	(50)
(三) 对照内地 31 个省市区的“十二五”规划, 我国未来十年年平均 9% 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适当的	(53)
(四) 未来十年面临的国内不利条件不构成对年均 9% 的速度的否定	(55)
(五) 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56)
第三章 未来十年保持 GDP 年均增长 9% 的必要性	(58)
一 正确认识保持 GDP 年均 9% 速度的必要性的政治前提	(58)
二 粉碎外部敌对势力以硬实力对我国实行“C 形包围”的需要	(60)
(一) 出现于 20 世纪中叶的冷战, 华沙条约组织消亡后一直存在	(60)
(二) 美国对付中国: 从“新月形包围”到“C 形包围”	(62)
(三) 打破包围、维持“恐怖的平衡”必须继续加快经济发展	(70)
三 突破美国对我国进行经济战争的“不稳定之弧”的需要	(72)
四 抵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软实力”乃至“软霸权”侵蚀的需要	(79)
(一) 单边冷战时期软实力及其现象形态软霸权的作用更大	(79)
(二) 消解软实力软霸权需要以硬实力强劲增长为基础	(83)
五 建立公平正义的富裕社会的需要	(84)
(一) 政治与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	(84)

(二) 保证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7% 以上需要 GDP 年均增长 9% 以上	(88)
(三) 解决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需要加快经济发展	(89)
(四) 未来十年提高扶贫标准需要相应的经济增长	(94)
(五) 农村养老制度全覆盖与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需要经济有更高的增长速度	(96)
第四章 未来十年保持 GDP 年均增长 9% 的可能性	(99)
一 实现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文化潜质	(99)
(一) 政治优势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99)
(二) 政治优势之二：社会主义制度	(100)
(三) 将中国人的文化潜质转化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大有可为	(102)
二 劳动力供给有保证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潜力	(103)
(一) 劳动力供给是有保证的	(103)
(二) 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极大潜力	(106)
(三) 未来十年更有条件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108)
三 未来十年储蓄率不会有大的下降，经济增长所需投资有保障	(109)
(一) 在居民储蓄与消费问题上怎样理解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109)
(二) 制度变革与政策调整后形成的居民储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112)
四 可以解决短缺资源的供给——以能源为例	(121)
(一) 科学应对“3J”问题有助于能源的保障供给	(121)
(二) 我国完全有能力按市场的游戏规则进口所需要的石油	(129)
(三) 主能源煤炭：提高回采率以保供给，降低使用比重以减排	(135)
五 协调发展现代三维经济体系将使中国经济充满新活力	(140)
(一) 协调发展现代三维经济体系，此其时也	(140)
(二) 围绕强国富民目标真正优化陆地经济结构	(143)
(三) 加快海洋经济的常规发展和立即着手战略性开发	(179)

(四) 加大发展空天经济的投入可为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 政治经济利益	(182)
六 涉外经济问题处理得好可以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积极 因素	(187)
(一) 正确认识涉外经济中积累的问题, 实现对外开放 模式转型	(187)
(二) 减少贸易顺差、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于经济 健康发展	(191)
(三) 用好现有外汇储备大有文章可做	(197)
附录 以高度责任感为经济预测进行准确定位	(205)
跋	(210)

第一章

探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仍须以 GDP 为基本指标

按照世界各国的通例，也沿袭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习惯做法，探讨我国未来十年（2011—2020）的经济发展，首要的自然是要确定 GDP（总量和人均）的增长率这一基本指标，围绕它，建立一整套指标体系，包括它的分解指标、结构性指标以及对它的约束性指标。然而，上述传统做法这几年遭到严重挑战。许多人试图彻底否定它，受其影响，政府决策部门、主管部门似乎对抓 GDP 也“羞羞答答”，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我们首先必须应对这种挑战并战胜它，才能具体讨论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三十年 GDP 年平均增速大约 10%），这使得我国的实力大大增强，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水平上了几个台阶，我国的国际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人的认识水平的局限、政治体制和政府政策存在缺陷，以及发达国家的以邻为壑、外国资本在中国对劳工采取早期资本主义那种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分配不公，等等。我们这里言简意赅地将问题的因果关系说得很清楚了，可是，有些人置上面列举的四大原因于不顾，却将一腔怨恨完全发泄到 GDP 身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南风窗》杂志总编辑秦朔，他的《告别 GDP 崇拜：中国发展的一种解读》（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实质上是一篇全面讨伐 GDP 的檄文。秦朔在书中虽然说 GDP 是“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社会经济福利的一个最好指标”、“没有它万万不能”，但那不过是虚晃一枪，他在目录中赫然标出：“GDP 不能衡量一切”——这句话在字面上虽然也可以理解为 GDP 有局限性，它不能包打天下，它并不能衡量所有的经济变量，但秦朔显然是另一种解释。请看秦朔紧接着使用的标题：“GDP 不能衡量社会成本尤其是环境代价”、“GDP 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

“GDP 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GDP 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GDP 不衡量幸福”、“GDP 不衡量分配”……一言以蔽之：GDP 什么也衡量不了！

对于 GDP，我们与秦朔的看法相反。我们认为，至少在现阶段，GDP 作为基本指标无可替代，不可或缺。下面拟作稍详细一点的分析。

— 1980—2010 年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GDP 作为基本指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抓 GDP 总量和人均增长速度就是抓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进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 1981—2010 年的三十年中，全国人民奋发图强，以 GDP 总量和人均的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量化指标^①，由于抓住了这个经济工作中的“牛鼻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1982 年中共十二大明确宣布了从 1981 年到 20 世纪末的 20 年实现 GDP 总量翻两番、人均达到 1000 美元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到 1995 年就已实现，比计划提前了 5 年。1997 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又提出到 201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2002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则将发展目标延伸至 2020 年，进一步提出 GDP 到 2020 年力争比 2000 年翻两番；考虑到我国是一个人口世界第一的大国，在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中人均指标更有意义，所以 2007 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比 2000 年翻两番。”

^① 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战略目标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采取的国民经济核算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 MPS），在这种核算体系中，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开始向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过渡，现在已废弃了 MPS 体系。SNA 体系中对应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是 GDP。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无论是邓小平谈话还是中共十二大提的战略目标都是“从 1981 年到世纪末的 20 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由于现在许多人已经没有了工农业总产值概念，为方便计，遂以 GDP 取代工农业总产值，将当年的战略目标“调整”为“从 1981 年到 20 世纪末的 20 年实现 GDP 总量翻两番”。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GDP 总量和人均翻两番的提前实现，已无悬念。

回过头来看，三十年来，我国以 GDP 总量和人均的增长速度为中心抓经济发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想：过往的三十年，我们不抓 GDP，我们抓什么可以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别无其他。一言以蔽之：1980 年以来的三十年，以 GDP 总量和人均的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量化指标所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二）民生幸福须以 GDP 增长为基础

现在有些书斋经济学家想当然地给 GDP 加上一个罪名，说什么考核 GDP 会不顾民生，甚至牺牲人民幸福。他们其实是分不清源和流、因与果。离开 GDP 增长，去谈什么民生，去谈什么幸福，那是真正的无源之水。我们这里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普遍关心的农村社会养老问题的解决过程，就足以说明。

我国农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破除了人民公社建立的依靠集体养老的制度后，农民退回到自然经济时代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然而，单纯的家庭养老形式显然不适应现代社会。于是，1992 年开始，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牵头搞了个“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图建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声称是“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农民养老资金来源“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其实，在这种方案中，养老资金除了农民自己交纳，后二者基本上是虚的：在“小岗村模式”下，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事实上已无集体经济；政府给的是政策扶持而不给予资金支持。在 2009 年 8 月国务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承认：“过去的老农保（1992 年开始实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引者注）主要都是农民自己缴费，实际上是自我储蓄的模式。”正是因为政府缺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没有财政资金支持，导致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2008 年 8 月 27 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做审计报告时指出：2006 年，在领取农保养老金的 331 万农民中，领取额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占 88%，有 120 万人月领取额在 10 元以下，占 36%。一个月不到 10 元钱，如何养老？怎么可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政府财政不拿钱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合乎历史潮流，没有存在的理由，事实上也搞不下去。所以，1998 年 8 月 3 日和 5 日，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的温家宝和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分别在整顿保险业工作小组办公室上报的《对农村养老保险的不同意见》上作了批示。温家宝副总理的批示是：“农村目前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对这个问题应该十分慎重。”朱镕基总理的批示是：“农村实行社会养老保险不具备条件，同意家宝同志意见，要逐步过渡到商业保险。请按此协调后，报总理办公会议讨论。”1999年7月，《国务院批转整顿保险业工作小组〈保险业整顿与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1999〕14号）提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保险的条件。对民政系统原来开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进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区别情况，妥善处理，有条件的可以逐步将其过渡为商业保险。整顿和规范农村养老保险的具体办法，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会同保监会等有关部门另行制定。”^①

正如有学者所说：“朱镕基和温家宝在1998年时批示说当时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实事求是的。根据国际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验来看，政府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并且国家财政也已具备相应的能力，反观我国当时的试点，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根本不拿钱^②，事实上当时的财政也没有这个能力。远的不说，我们就从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开始提到的1986年说起。1986年时，全国的财政收入仅2122亿元，人均仅200元（全国总人口10.5721亿人），这点少得可怜的钱，侈谈什么社会保险？当然，从1986年到1997年，经济是快速发展了，然而，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从1986年的20.80%下降至1997年的11.57%，当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8651.1亿元，人均也只有715.54元。这点钱除了用于行政管理费、国防费、科教文卫和救灾支出，哪还有钱用于社会保险啊？所以，朱镕基和温家宝基于1998年以前的国情说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无可非议的。”^③

时隔11年之后，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务院于2009年9月1日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① 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赵殿国《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回顾与探索》，《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年第5期。

② 当然有所谓税收优惠——“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理论上也可以认为是政府的一种间接出资，但是，在绝大多数农村，对养老保险的“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实际上也是一句空话。

③ 李茂生、李光荣主编：《中国“三农”保险发展战略：努力构建三支柱“三农”保险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国发〔2009〕32号)称,“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务院决定,从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以及“个人(家庭)、集体、政府合理分担责任”的原则,改变了以往只是原则性地讲“国家给予政策扶持”,明确提出了“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这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可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且不说55元是否太低,就本文讨论的问题而言,如果没有这10年(1998—2008年,2009年作决定自然要以2008年的数据为依据)GDP的高速增长以及伴生的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可能吗?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61330.35亿元,人均达到4618.25元,是1997年的6.45倍;2008年全国财政支出62592.66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就有6804.29亿元,仅此一项支出就达到1997年全国财政收入的78.25%。在朱镕基当总理时,无论你将民生问题提得多么高,无论你设计出多么美妙的“幸福指数”,1998年时,你能给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发放55元的基础养老金吗?反过来,因为GDP增长了,财政收入增长了,当国务院规定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时,人们还可以提出扩大覆盖面和大幅度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标准的意见。^①所以,离开经济发展,离开财政收入的增加,什么民生,什么幸福,统统都没有物质基础,只能是假话、空话。

二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告别 GDP?

(一) 关于 GDP

伴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经济发展的统

^① 例如,在李茂生、李光荣主编的《中国“三农”保险发展战略:努力构建三支柱“三农”保险体系》一书中,就提出将农民养老的标准定在每天1美元(也就是不使他们陷入绝对贫困)是必需的,“按人均每天1美元计算,算大账,1年约2400元,政府基础养老金所占比例以50%—60%计算,1人年为1200—1400元,即每人每月100—120元。据此,我们认为,在目前起步阶段,为谨慎稳妥计,政府为农民提供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定为每人每月100元是合适的,我国目前财政也完全有这个能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计，也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 MPS）过渡到产生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账户体系（简称 SNA）。从 1985 年开始进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到 1992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这一体系。相应地，主要统计指标也从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逐步改变为国民生产总值（GDP）和人均 GDP。此后的几个五年计划（规划），均以 GDP 为主制定。而且，为保持国民经济资料的连续和可比性，国家统计局以国民收入和其他有关历史资料为基础，推算出 1952—1984 年国内生产总值历史资料，根据首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资料又对 1978—199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调整，于 1997 年出版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一书，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一套可比的国内生产总值历史资料。

国内生产总值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和国民总收入 GNI（Gross National Income）较之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使用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在反映社会经济活动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GDP 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一方面，GDP 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规模、人均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当今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关心其经济增长，因为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不仅没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这个国家能否存在都是问题。而 GDP 增长率则是反映经济增长情况最重要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指标，人均 GDP 是表示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最强的综合性指标。另一方面，GDP 既是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工具，也是国际上普遍适用的考察国民经济发展变化进行横向比较的重要工具。GDP 是反映经济规模的基础性的宏观经济指标。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总是对等的，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在国际上就没有人把你当回事，也就很难对人类作出什么贡献。一个国家的 GDP 与该国承担国际义务、享受优惠待遇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大小密切相关。例如，GDP 和人均 GDP 是联合国确定其成员国承担联合国费用、维和费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世界银行确定其成员国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定其成员国发言权时也要重点考察这一指标。

至于 GNI，则是由我们过去很熟悉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Gross National